法治日报
星期三
2026年10月14日

法学院

09 理论专刊

主编/陈红卫
编辑/刘秀宇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胜利

LEGAL DAILY

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

□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形势新挑战使得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人类面对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如何有效应对世界大变局、如何完善与重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世界上有不同的答案和方案。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接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及若干地区性、领域性治理倡议，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民主法治的方向变革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和中国方案。

在这一系列倡议中，法治是其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国际法治精神”“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法安天下”等理念和理论，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确立了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

坚持宪章至上

81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让国际社会痛定思痛，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发起成立了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构筑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如今联合国成员国已经达到193个，联合国规则体系更加丰富。80多年的风风雨雨证明，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格局的中流砥柱，《联合国宪章》是世界秩序的“定海神针”。

当前，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的权威面临各种挑战，这是全球治理最大的风险。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要重温联合国创立初心，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为维护国际法、确保国际法治作出重要贡献。

坚持规则导向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国际社会中，法律是调整国家关系、规范国际治理的共同准绳。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全球治理的规则，应当是基于民主程序和共识机制制定出来的，是体现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兼顾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的良好规则。

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生态环境保护、人工智能治理、互联网治理、弥合数智鸿沟、全球人权治理、全球安全、反恐、禁毒等重要领域引领和主导国际规则制定，不断完善相关国际规则。

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主动对接、积极吸纳高标准国际规则特别是经贸、环境等领域的规则，用好国内国际两类规则；另一方面，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要坚持规则导向。大力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和人类未来，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有效，建设国际法治体系。

坚持普遍遵守、平等适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必须得到遵守，国际法必须得到尊重。

在国际法的遵守上，谁都不能例外。尽管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水平和体量规模不同，但这些都不是规避和违反国际法的理由。对国际法基本原则，如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必须得到国际社会普遍遵守。

在国际法的适用上，各国政府、执法机关、司法机关都不能搞“双标”，不能选择性执法司法。国际法是全球共同规则，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应当得到严肃对待和严格适用。

在国际法的实施上，秉持法治精神，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模范遵守国际法、正确适用国际法、坚定维护国际法，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对外关系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各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发挥应有的作用。

坚持公平正义

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公平正义，首先是奉行主权平等。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调整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

其次是推动实现全球正义。全球正义是基于国家平等、民族平等、种族平等、文明平等、人类社会成员平等等理念和原则而调整国家关系、推进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公正化、合理化、和平化的制度建构和实践活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公平正义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及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价值尺度，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是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价值准则。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必须全面促进全球正义，变革与公平正义相悖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共同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

推动秩序重构

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全球治理的重要任务是重构现存秩序。重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结构性优化和创新。

重构国际秩序，最重要的是改革国际治理架构。在过去的80余年间，经过许多国家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这个框架为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的治理框架并不完善。联合国的建设和改革，必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制度性发言权。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既坚定维护国际秩序，又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和崇高愿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坚持法安天下

法律是和平的基石。自古以来，无论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和谐，还是部族与部族、国家与国家的和平，都是法治的核心价值，也是法治的显著优势。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以法治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

《联合国宪章》规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在法治文明发展进步的今天，对待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要弘扬法治精神，坚持法治原则，善于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深知和平安宁的珍贵，始终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而坚持不懈作出努力。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上的发言节选]



传统、中国与时代：中国民法学自主性的三重维度

□ 谢鸿飞（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民法学的发展之路颇为曲折。从废除旧法统另起炉灶，到辗转继受苏俄民法；从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启蒙，到世纪之交关于民法典编纂体例的长久争鸣，几代学人筚路蓝缕，始终在“继受”与“自主”的张力中艰难求索，在继受域外法治精华的同时，未曾放弃主体性意识。他们立足中国实际、回应中国实践，为我国民事立法提供了体现我国国情和时代特色的理论资源。民法典的颁行，正是这一自主性努力的结晶。

进入后民法典时代，立法论基本退潮，解释论成为主流，学者也成为规则的阐释者、体系的整理者和漏洞的填补者。在这种研究格局中，民法学的自主性将如何展开，成为最值得关注的学术方向问题。

发现优秀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沉淀着这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积累的价值观念、情感认同和社会交往理性。优秀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历经岁月淘洗而存留，如今依然值得发掘。民法典诸多制度和规则，都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血脉。如倡导“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些规定都深植于中国人对家庭责任和人伦秩序的固有理解。

发掘优秀法律文化的主要路径是深入各类行业习惯与民族习惯，辨析其中蕴含的合理因素。习惯源于长期的共同生活，是人们在无数次往复博弈中筛选、沉淀下来的规范。其未经立法程序的打磨，却自带一种粗粝的生命，往往比抽象的成文规则更贴近实际、更富弹性，更能适应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特殊性。成文规则追求普遍与统一，习惯则天然地容纳差异与个别；成文规则自上而下确立，习惯则自下而上地生长。

习惯内生于社会，无需经过立法程序认可，却能建立人与人合作的行为框架，帮助人们克服生活中的偶然与意外。在遵循习惯的过程中，个体自觉地依循规则行动，这正是习惯的独特价值所在。它的效力并非来自国家强制，而是来自共同体成员的内心认同与反复践行。这种自发性遵从，是任何外在强制都难以替代的社会秩序基础。因此，体现着民族价值、民族情感和社会交往理性的习惯，可谓最珍贵的法律遗产。若这些习惯能够满足社会生活的新需要，便可在条件成熟时，经由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定。

我国素有尊重习惯的传统。民法典第十条明确将习惯作为补充法源，赓续了这一传统。习惯是民法学自主性最能施展的领域：既有订婚、彩礼等流传已久的传统习惯，也有随着技术和经济迅猛发展而层出不穷的商事习惯，如各种非典型担保，它们填补了法律空白。民法学家的重要使命，就是从习惯中提炼法律规则。发掘习惯不能停留于表面描述，应深入其背后的价值依据与运行逻辑，辨别何者仍契合当代社会交往的理性需求，何者已随时代推移而失却正当性。发掘本土习惯已属不易，感知习惯随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流变更需功力，这正是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优秀的文化观念可以作为检验民法规则的尺度。规则若与群众的伦理直觉相抵牾，纵在教义学上无懈可击，其正当性亦须重新称量。传统由此从被解释、被继受的对象，转为衡量现行法的尺度。当然，这种检验不能退化为对传统的一味迁就，传统本身也必须接受时代价值的检验。

发掘本土的现实法律需求

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深刻塑造着民事法律制度。民法学要获得自主性，关键在于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并将其转化为规范表达。通过挖掘本土经验，才能形成原创性理论。

在经济层面，农村土地制度最具典型性。土地公有制决定了我国用益物权制度须承担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重任。民法典没有照搬地上权、永佃权等传统概念，而是结合城市建设用地与土地承包经营的实践，创设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概念，并进一步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新设土地经营权。这一制度无法诉诸传统民法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的既有理论，是民法学界回应中国国情的原创性贡献，最能体现民法学的自主性。

在社会层面，村委会、居委会、非营利法人等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值得关注。这些组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承担着独特的治理功能。村委会、居委会既是基层群众自治的载体，又在诸多民事关系中充任主体。民法典赋予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资格。“特别”二字，恰恰标记出传统法人理论力所不逮之处，如其权利能力的边界何在、责任财产如何界定、从事民事活动的范围是否限于“为履行职能所需要”？这是我国民法学必须回答，也是最有条件作出原创回答的问题，其制度经验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文化层面，我国注重家庭伦理与人伦秩序的传统，深刻影响着婚姻家庭、继承等固有法领域。在婚姻立法中，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情感与态度尤值尊重。家庭法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纯粹的功利计算和权利逻辑常常失灵：其所要处理的，不仅是财产与契约，更是亲情、伦理和代际责任。如何让法律规则既不违背现代人格平等的底线，又尊重一个民族对家庭、对亲情的固有理解，正是本土法律需求中最微妙、最能检验学术功力的一环。民法学者在这些领域努力调适经济理性与人伦秩序的关系，同样是在为自主性知识体系添砖加瓦。

回应数智时代的法律挑战

民法典是一部富有“时代感”的法典：其确立了绿色原则，将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等新事物纳入法典，回应了生态保护与数字时代的双重关切。

目前，我国民法学最可能作出贡献的领域是回答数智时代的法律问题。数字与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深刻重塑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同时也给民法学提出了全新课题。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算法等是传统民法难以完全容纳的新事物。这些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其既超越国界，又无成熟范式可循；谁能率先制定规则，谁就能引领方向。数智时代的民法问题具有“起点平等”的特征：没有任何一个法域拥有既成的、可供直接移植的成熟方案，这使得自主性的空间被空前放大。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字应用场景和最丰富的实践样本，这为民法学回应时代之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耕耘已卓有成效：民法学者对数据确权、个人信息保护、算法治理等问题的细致研究，推动了数据法学、计算法学的形成。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仅作指引性规定，学界对此贡献了诸多确权方案，方案的繁丰恰好表明，数据问题超越了传统财产权的框架，必须重新思考权利客体的边界和权利构造的逻辑。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如何在人格尊严与数据流通之间探索一条既符合我国数字经济实情又不失规范精确性的道路，同样考验着民法学者的智慧。对算法治理，民法的介入同样面临定位难题。算法，一方面嵌入合同缔结与履行、自动化决策等私法过程，其歧视、滥用和“黑箱化”严重侵蚀了私法自治和平等保护；另一方面又高度依赖技术黑箱与平台支配地位，但若径以行政规制或公法手段替代，又难免伤及技术创新的活力。可以预见，中国在数智时代的民法规则建构中，将为世界民法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上述三重维度，分别对应传统问题、中国问题和时代问题，传统问题关乎文明赓续、中国问题关乎制度根基、时代问题关乎未来发展。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中国民法学不再是对域外法学的译介和追随，而是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中国实践、贡献中国智慧的知识体系。唯其如此，中国民法学才能真正获得学科尊严，并为人类共同的民法文明增添新的光彩。

守护知识产权公共领域 夯实创新生态法治底座

□ 李亮（武昌理工学院教授）

谈及知识产权制度，社会舆论往往更多聚焦私权保护，关注强化侵权治理、提高损害赔偿标准，以此激励创新创造。但一套科学完备的知识产权法治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专有权利的保护，必须筑牢稳定充足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并非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而是创新生态不可或缺的法治空间。它为接续创新储备基础素材，保障知识信息普惠传播，维护社会公众获取知识文化的基本权利，是知识产权制度实现激励创新与社会共享平衡的重要制度载体。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是指不受专有知识产权排他效力约束，社会主体可以自由利用的知识与表达。保护期届满的文艺作品、基础科学原理、通用符号、不具备独创性的事实信息，都是公共领域范畴。对于这部分资源，使用者无需取得权利人许可，也不必支付许可使用费，可直接用于学习研究、改编再创作，是全社会共同积累的知识宝库。知识产权本质是有限度的合法垄断：法律赋予创作者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以此补偿智力劳动、激发创新活力；保护期限届满，智力成果回归公共领域，回馈全社会。如果不断扩张私权边界、挤压公共领域生存空间，知识产权制度内在的利益平衡机制就会遭到破坏、抑制创新活力。

数字时代公共领域遭遇新挑战

数字技术迭代，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护带来全新现实挑战。传统环境下，公共领域内容多以纸质实体载体呈现，权利边界相对清晰。进入数字时代，海量作品完成数字化转换，借助算法技术可以批量抓取、重组文本图像。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大量依托公开网络资源，素材中既包含尚在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也包含大量公共领域内容。

实践中，部分市场主体对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古籍、已过保护期作品、事实信息进行数字化包装后，试图创设全新知识产权，将公共领域资源变相私有化。另外，权利人利用商标、外观设计等制度工具，反复包装保护期已经届满的作品，变相延长实际保护周期，阻碍公众正常利用。长此以往，可供自由取用的知识原料将持续缩减，创新赖以生长的土壤也将不断萎缩。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做好个体智力成果的确权与保护，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公共领域不需要专门予以关注。该观点的误区，是把知识产权制度简单等同于确权赋权。知识产权制度设立初衷，绝非对智力成果提供永久性私权庇护，而是通过有限保护实现知识传播，增进社会整体公共福祉。划定知识产权私权边界，重在激励创作产出；守护公共领域，则重在保障知识传承与接续创新。倘若缺失公共领域这一制度板块，后续创作者的借鉴、引用、改编前人成果，需要逐一授权谈判、支付许可费用，大幅增加创新成本。纵观人类创新史，绝大多数创新成果均建立在前人知识积淀的基础之上，若脱离公共领域提供的基础素材，二次创新、迭代创新便会举步维艰。

厘清私权保护与公共领域的辩证关系

强调守护公共领域，绝不意味着弱化知识产权私权保护，二者辩证统一、并行不悖。保护专有权利，是尊重创作者智力劳动，保障创新投入获得合理回报；守住公共领域边界，是防范权利不当扩张，避免知识产权垄断阻滞知识流动。司法实践中始终秉持这种平衡思维：著作权司法中明确区分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对于纯粹事实信息因缺乏独创性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本质就是守住公共领域底线；商标制度中禁止将通用名称、描述性词汇注册为独占商标，目的是防范公共语言资源被私人独占。上述法律规则共同构筑制度屏障，防止知识产权权利无限扩张，守护全社会共有的知识财富。

但也要看到，数字场景下公共领域保护存在一些制度短板。一方面，大量公共领域资源完成数字化之后，部分网络平台借助格式合同、技术保护措施，对古籍档案、已过保护期作品设置访问、下载限制，依托数据库特殊权利封锁本应开放的公共知识；另一方面，权利边界模糊给公众和市场经营主体带来合规焦虑。普通创作者与企业难以准确判断哪些素材属于公共领域，可以自由利用。害怕因错误利用而陷入知识产权纠纷，于是选择自我约束、避免使用公共资源，客观上造成公共领域资源被闲置，加重创新主体合规负担。私权保护与公共领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只有厘清二者的边界，才能让知识产权制度回归激励创新的本源。

协同构建公共领域法治保障机制

筑牢公共领域的法治保障，需要立法、司法、行政与网络平台多方协同发力，形成制度合力。立法层面，知识产权制度修订应当恪守权利法定原则，明确公共领域的制度定位，禁止通过法律解释变相扩大专有权利的覆盖范围，厘清私权保护与公共领域的边界。司法层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应当秉持审慎克制，严格区分具备独创性的受保护表达与归属于公共领域的思想、事实、通用元素，对缺乏法律依据的权利扩张诉求依法予以否定。行政监管层面，应当强化商标、外观设计的确权审查，重点规制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对公共知识资源重复确权、变相垄断的不当行为。网络平台则需压实主体责任，不得借助技术壁垒封锁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资源，畅通公众获取公共领域资源的渠道。

守护公共领域，亦是培育全社会创新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创新无法凭空生成，任何新思想、新作品都离不开对既有知识的吸收借鉴，公共领域正是创新的“公共原料库”。知识产权法治教育不应片面侧重权利申请、侵权维权索赔，还需阐释公共领域的制度价值，引导创新从业者完整理解知识产权制度的平衡理念。对于企业、文化创作主体而言，亦应当正视公共领域的价值，善于合理运用公共知识资源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创新效率。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把“双刃剑”。私权保护不足，将挫伤创作者创新积极性；保护过度、挤压公共领域，则会阻碍知识流转传播。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既要充分保障创新主体合法知识产权，也要守住公共领域的法治边界，实现私权保护与知识共享的动态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释放知识产权制度效能，持续产出高质量创新成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法治支撑，同时兼顾个体创作回报与知识普惠，推动知识产权治理更好适配数字时代创新发展需求。

